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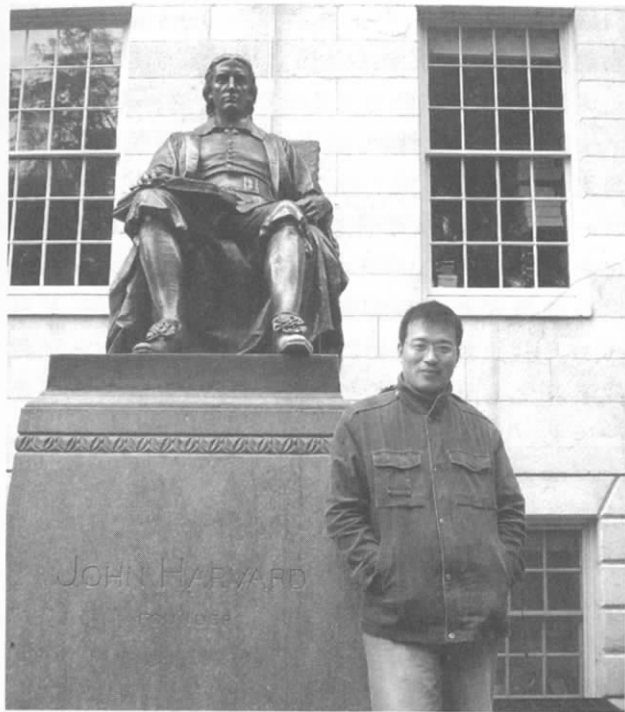
●研究生课程讲坛

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主讲人:陈恒教授

参与讨论者:奚昊捷、常程、任荣、王丽娟、贾斐、苗倩、王鸣彦、张晓婷、郭婷、方超、陆路、周俊、田婧婷等。

整理人:奚昊捷、任荣、常程。



主讲人简介:陈恒,1968年生,史学博士、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为古代希腊史、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全国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新史学》(大象出版社[简体版]、知书房出版社[繁体版])主编、“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译丛主编,曾编辑《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西方历史思想经典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学术著作,翻译学术著作《多面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合译)、《古典学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什么是历史》(商务印书馆)、《希腊化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译)等。

陈恒教授: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规划,城市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城市社会学(Urban Sociology)、城市历史学(Urban History)、城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城市地理学(Urban Geography)、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城市气象学(Urban Meteorology)等。从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化研究(Urban Culture Studies)这一范畴。可见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门人文

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其中城市史学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学科。

大家都明白,城市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史研究了。城市史研究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研究城市的起源、嬗变,研究城市本身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城市的规划与布局,研究城市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城市设施、居民生活与礼俗的变迁,而且还要研究那些有关城市的理论。西方学者一方面从社会进程、理论渊源、学科发展等几个

方面来论述城市史学产生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又通过创办城市史期刊、筹建城市史研究组织、确定城市史研究主题、探索城市史理论与方法等等,促成了城市史学的蓬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史学本身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性质:它综合了各门学科的优势,吸收了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从这几点看来,西方学者的研究已呈现出一定的成果,这都是大家需要加以关注的。各位同学虽涉足西方城市史研究不久,但对于西方城市史,想必也形成了一定的认识与理解。今天围绕着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交流心得体会,对于疑难困惑之处,大家一块儿探讨!

奚昊捷:为什么西方会兴起城市史研究?

陈恒教授:西方城市史研究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出现是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有关。工业革命是一座分水岭,城市的发展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工业革命不仅在技术上突飞猛进,而且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比如在19世纪20、30年代,英国许多城市的人口以每10年40%到70%的速度增长,到1900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70%。由于年轻人是这种流动的群体,传统家庭生活瓦解了、道德观念变化了。设施不佳、空前拥挤的城市本身成了许多新来居民的人间地狱。由于居住拥挤以及卫生环境条件恶劣,穷人区居民的健康水平下降,犯罪率也在呈上升趋势。社会处于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激烈转型时期:个人如何生存?家庭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城市恶劣的卫生、交通状况如何解决?城市化对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又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最终又会带来哪些影响……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都亲身经历这一变革,对此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腾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提出了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的概念,前者指小规模、有内聚力的、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后者指由现代城市或国家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大社会”;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译“涂尔干”)在读书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那些失去了稳定社会规范引导的人们惶惑不安的心理状态;西美尔也论述城市社会对人们心态的影响;马克思也一直关注城市问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是经典的都市著作;韦伯则以更精确的历史分析方法考察了大量城市。城市问题促进了社会学研究快速发展,也是城市史研

究兴起的社会背景。

常程:这样看来,正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先驱,吹响了城市史研究的号角吗?

陈恒教授:不错。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而且这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最易为历史学所接受。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有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例如文化转移、不同社会之间的接触所引起的变化——对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研究主题。可见,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或方法上的分野。因此,历史学家从由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所首创的社会科学中汲取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变化理论,并把这些理论应用到城市史、家庭史、性别史、口述史这类直接反映当今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不偶然。这是城市史兴起的理论渊源,城市史与社会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

陆路:那么,西方城市史是在何时脱离社会学与人类学“母体”、成为独立的学科的呢?

陈恒教授:从学科本身来看,城市史属于新文化史的一个分支,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19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哈伊津哈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著名女历史学家、美国历史协会主席(2002年)亨特(Lynn Hunt)在《新文化史》中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称为“新文化史”。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新史学(政治史→社会史→新文化史)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抗衡,只是大势已去而已。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但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因此,研究历史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大历史”(自上而下看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小

历史”(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意义,即历史研究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从过去注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探究转变到对事物和事件意义的探究。持久追求新话题的新文化史,自然会把最能表达西方文明本质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

王丽娟:城市史学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更是历史学家不断反思的结果。不过,西方人对城市的认识似乎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了。古希腊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对城邦——城市国家作过发人深思的论述;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探讨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夸美纽斯的《世界图绘》传递出乌托邦式的城市理念;启蒙时代的伏尔泰、亚当·斯密等等也对城市有过精彩的评述。可以这样说吗:西方世界对城市的关注一脉相承,最后诞生城市史学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陈恒教授:概括的很好。西方历史上虽然充斥着大量有关城市的文献,但这些记述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自20世纪早期以来,这一切都逐渐改变了。有关城市史的期刊与连续出版物出现了、城市史研究组织越来越系统化了、城市研究主题越来越明确了、理论与方法也越来越能反映出自身的本质特色。一言蔽之,科学的城市史已经真正建立起来了,城市研究空前繁荣。

贾斐:烦请陈老师对相关刊物作一介绍。

陈恒教授:专业杂志、研究机构的出现是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最近几十年,西方涌现出一大批城市史研究杂志,比如《中欧城市史文献》(1963)、《现代都市史通报》(1970)、《都市史评论》(1972)、《都市史年鉴》(1974)、《都市史、城市社会学、古迹保护杂志》(1974)、《历史上的城市》(1977)、《城市史》(1977)、《古老城市》(1978)、《都市:艺术、历史和城市人类文化学》(1979)、《都市史》(1992)、《规划史研究》(2002)、《规划史杂志》(2002)等一大批专业杂志。这些杂志设立专题以引导研究的方向、报道相关的史料与书目以便于学者的研究,在促进城市史研究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具体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创办的《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双月刊),该杂志有近30年的历史,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城市现象,颇得好评,每期设定一个主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讨论,比如曾出过“移民与城市”、“城市发展”、“城市设计史”、

“城市文化”、“城市政治”、“环境与城市”等专辑,影响比较大。

剑桥大学创办的《城市史》(*Urban History*,一年2期)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城市历史,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每期都有一些质量很高的学术文章。特色栏目有书评、博士论文摘要、书目索引等。该杂志是研究城市文化的必备读物。

郭婷:麻烦再介绍一下相关研究机构的情况。

陈恒教授: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陆续成立了一些相关的城市史专业组织。成立于1919年的城市史协会(The Institute of Urban History)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史研究中心,创办宗旨在于促进有关城市史、市镇史和地方史的研究。美国历史协会的城市史小组则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

伴随城市化浪潮在各地的涌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又陆续建立了许多这类组织。创立于1969年的城市事务协会(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是大学城市事务研究会的继任机构,《城市事务期刊》是该机构的主办刊物。它的宗旨是促进有关城市生活、城市化信息的发布,支持高等学府、研究机构有关城市事务的发展,在促进城市事务专业化、学术化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位于英国莱切斯特大学的城市史中心(Centre for Urban History)成立于1985年,现已成为城市史方面跨学科研究、研究生教育重要的国际性中心。美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史协会的宗旨是促进美国规划史的教学、研究、出版和公共教育。伦敦大学和伦敦博物馆及其他机构一起于1988年成立大都市史中心,目的是以宏观和比较的方法促进对伦敦自出现以来的特性和历史的研究。附属于国际规划史协会(International Planning History Society)的城市史协会(Th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于1988年,目的是促进人们对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区域中的城市史研究,提高这一研究领域的水平。在欧盟的支持下,“欧洲城市史协会”(European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于1989年建立。国际规划史协会成立于1993年,目的是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规划史研究。这些协会会员包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艺术史家、建筑史家、经济学家、规划学家、公共事务人员以及其他各领域的专家。它们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硕士、博士人才;为成员出版、举办会议、相互联系提供方便。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城市史研究。

苗倩:从这些刊物、研究机构的诞生、演变来

看,西方城市史研究确实已经形成体系。那么,参考其他历史研究领域最近数十年的情况,在城市史研究领域中,是否也分化出各种流派?

陈恒教授:我们以时间为线索,一步一步地来看。作为一个学科的城市史,首先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段时间出现的。美英是城市史研究的重镇。

开启美国城市研究先河的是以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1916年,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 1864-1944)发表《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首次阐明城市社会学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方法。受其影响,许多学者纷纷转向城市研究,并于1925年出版了成果汇编《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由此奠定了美国城市研究的基础。此学派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30年代,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 1888-1965)、韦德(Richard Clement Wade, 1921-2008)的著作如《城市的兴起》(1933)、《城市边境》(1959)则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二战之前,美国史学界流行特纳的边疆学说。而施莱辛格反对边疆学说,代之以城市的方法解释美国历史,这标志着美国史学界对城市史持久兴趣的开始。

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是以兰帕德(Eric E. Lampard)的《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文的发表作为新城市史学与旧的方志式的城市史相区别的标志。

英国的城市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最早的英国城市史研究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主要是一些城市编年史,这一过程持续了四个多世纪。到19世纪晚期,在德国、美国的影响下,应该开始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研究,特别关注中世纪市政史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格罗斯(Charles Gross, 1857-1909)、梅特兰(F. W. Maitland, 1850-1906)是著名的代表,他们为英国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真正作为学科的城市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迪奥斯(Jim Dyos, 1921-1978)是奠基者,而且是城市史组织(Urban History Group, 1962)的创办者。他还模仿美国模式出版《时事通讯》(Newsletter, 1963)和《年鉴》(Yearbook, 1974)。

除了以上这些影响较大的流派之外,还有很多

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家提出各自的观点与方法,在今后的学习中可以一步步深入了解。

方超:研究城市史通常有哪些路径呢?

陈恒教授:城市史研究几个常见的路径是城市化研究、城市传记研究、主题城市(从经济、社会、建筑等不同角度切入)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城区史研究和城市比较研究等。

王鸣彦:那我们怎么看待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诸如韦伯、古朗士、皮雷纳等人的城市研究?又如何看待当代一些历史学家的城市研究?比如汤因比。

陈恒教授:我个人认为德国的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法国的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比利时的皮雷纳(Henri Pirenne, 1862-1935)等人的著作属于早期城市研究范畴,他们的论述虽然很重要,影响也很大,至今还有启发意思,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激发人们对城市史研究的兴趣。当代英国的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 1892-1957)、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法国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等人的城市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虽然对城市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但不属于专业的城市史学家。

张晓婷:为什么是美英二国引领了战后城市史学的风骚?

陈恒教授:宏观上看,城市史学的发展与各个国家、地区城市发展进程是相适应的,城市发达的地区,城市史研究也非常发达。在如同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中,工业革命使乡村社会快速实现了城市化,自19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发展而带来的问题就为现代城市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城市史研究兴起于英美自然是合情合理的。而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从一开始这些国家的城市在社会生活中就占据优势,因此也就难以把城市史从通常的政治史、行政史或者经济社会史的著作中区分开来,因为城市是分析这些地区民族、社会、文明诸问题最便利的单位,但很难归入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东欧、中国、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乡村经济占据优势,缺乏重要的工业中心,因而难以使城市史研究得到快速发展。

在战后,英美等成为以信息技术等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领头先锋。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由此出现。这次工业化又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使人口的更大比例集中于城市或城郊,许多国家成

为城市国家。因此作为这股浪潮先锋的英美在享受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成果之时,也遭受了大量突出的新城市化问题。英美政界学界不得不再一次将注意力放在城市研究上来。现实的需求使得英美在城市史研究上率先起步,得以引领城市史学。此外,战前大量优秀的欧洲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特别是德国和俄罗斯的人文社科专家,为避战祸而离开欧洲大陆迁居英美。这些学者为英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包括城市史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的诞生与发展。世界人才的聚集,更使得英美得以在城市史研究方面得以独领风骚。

任荣:我们知道,从20世纪50、60年代起,西方知识界风起云涌,各种学科出现了转向,如历史哲学研究开始转向语言学,社会学则受到解释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人类学研究开始关注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阶层、移民、女性、同性恋等各类社会群体等等,那么城市史研究想必也不曾“幸免”吧?

陈恒教授:确实如此。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城市研究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是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1942-)、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1935-),他们把社会空间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我们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该理论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去考察城市问题,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社会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

另一方面,城市史研究并没有完全停留在理论发展的层面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危机引起了“新城市史”研究。“新城市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可以通过分析美国人口普查的各种表格及其相关的其他各种数据(特别是税收记录,城市姓名地址簿,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簿)来重建城市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新城市史家是一群聚集在瑟恩斯罗姆(Stephan Thernstrom, 1934-)周围的年轻的美国城市史家。这些新城市史家并不像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布里格斯(Briggs)、雅各布斯(Jane Jacobs, 1916-2006)、迪奥斯等人一样关注“城市”现象的研究,而是忙于研究社会流动、少数群体政治、市中心贫民地区等问题,因为研究城市问题不仅需要从经济的角度,而且需要把这作为一个社会变化进程来研究,研究移民同化、社会分层新形式、工作与休闲之间严峻对

立等等问题。严峻的社会问题激发了人们对城市史的思考。

周俊:既然城市史研究有不同的方法与路径,那么我们能否对城市史研究概括的介绍?

陈恒教授: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科,城市史总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确定,处于困惑之中。英国城市史之父迪奥斯把城市史描述为一个“百纳主题”、一个“知识领域”,可见城市史不是可以用传统方法来定义的学科。首先,人们要关心城市是怎样产生、发展的。这是研究城市的内在观点,其重点在于描述、分析城市大小和形状的变化、城市人口和经济构成、人口组成部分的分布、商业设施和生产设施的分布、城市政治和城市政府的本质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要尽量评估城市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以外在观点来研究城市。关注的是城市这一文明现象是怎样广泛影响政治发展的,比如对美国革命或新政的影响;是怎样广泛地影响经济事件的,比如对工业化的影响等等。综合这两种方法则称之为社会生态学方法。尽管研究城市史的方法越来越复杂,但城市史从没有彻底摆脱城市传记框架的约束。城市史研究压倒性的方式是以单个的城市中心作为研究焦点,从早期的经典研究比如斯提尔(Bayrd Still, 1906-1992)的《密尔沃基:城市史》(1948)到现代的系列丛书,都是如此。无论如何,人们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追述城市发展史的。

城市史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地方史、市镇史、建筑史、规划史、城市地理史等。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史这一范畴,因而城市史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或者是说在其他学科基础上形成自身研究的,它综合各门人文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的历史、现状并审视未来。因此,也有人怀疑城市史的合法性。

田婧婷: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西方城市史研究似乎可以为我国史学发展带来许多可鉴之处,特别是那些研究方法、理论。是这样吗?

陈恒教授:对。当下通过对西方城市史,特别是那些社会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拓宽和深化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如美国汉学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就“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

道”。而华裔美国学者王笛的《街头文化》更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与此前的自上到下的对城市精英和城市管理、警察的研究不同,这个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从下到上的考察视角,即街头和丰富的街头文化贯穿全书。

不仅如此,由于当代中国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研究西方城市史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人类关怀的现实意义,即可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提供借鉴和理论参考。



陈恒教授与研究生研讨情景

(上接第 136 页)

六、推荐的书要少而精、类型要丰富

学生课业压力大,时间、精力有限,所以推荐书目一定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这样既能减轻学生负担,同时也能取得预想的效果。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推荐的书目在数量上和难度上都要有差异。此外,推荐的书目不要集中在一、两种类型上,除了历

史传记、历史事件等,也可以推荐一些历史方法论的读物,如葛剑雄的《历史学是什么》等。

总之,对中学历史教师来说,仅仅限在课堂教学活动是不够的,要使学生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并能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推荐课外历史书目是非常必要的一项工作;如何根据学生实际、提高推荐书目的科学性,则更是一件需要付出长期、艰巨努力的事情。